

# 中国企业灾后何以“涅槃而生”？

——来自地方政府应急降费政策的经验证据

张翼飞 王希瑞

**内容提要:**本文以2010年洪灾为事件冲击,以2010年前受灾不频繁的地区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2008—2012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和强度双重差分模型追踪应急突发事件后企业成长情况的变化。研究表明:(1)经营所在地受洪灾影响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资产收益率稳中有升,且未出现资产减持和裁员的现象,这缘于灾区政府实施了以减免和缓缴社保费、减免租金和利息为核心的固定成本降费政策,以及补贴或缓缴水电费、清理行政收费项目为代表的可变成本降费政策;(2)在灾前减税积极性高、财政自给率持续提升、灾后实施税收优惠的地区,政府出台降费政策的积极性更高。本文研究结论为应急财税政策的系统性优化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 应急事件 企业成本 地方政府行为 降费 企业成长

**中图分类号:** F8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36(2023)05-0110-14

##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以新冠疫情和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为代表的重大应急事件发生频繁,使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链条被割裂,继而面临营业收入快速下降<sup>[1-2]</sup>、成本降低不明显、非日常损失急剧上升<sup>[3-4]</sup>等困境,这些困境增加了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不确定性。政府及时出台应急政策助力市场主体转危为安,是经济复苏的必要举措。与欧美国家“拖延策略”的治理方式不同,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应急事件及时管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统筹的治理战略<sup>[5]</sup>。2020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强调:“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演进脉络看,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是一个跳跃式升级的过程,且伴随着政府高度自觉的行为特征<sup>[6]</sup>，“在灾难中学习”成为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地方政府的应急政策是否积极有效,应急政策的施策重点又聚焦于何处? 本文希望回答上述问题,以期为政府应急治理能力的优化提供经验借鉴。

公共财政是防范化解公共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应对应急事件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手段<sup>[7]</sup>。当应急

收稿日期:2022-11-30;修回日期:2023-03-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减税降费背景下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研究”(20AJY024)

作者简介:张翼飞 浙江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讲师,杭州,310018;

王希瑞 上海海关学院海关与公共经济学院讲师,上海,201204。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事件发生后,政府会通过财政、税收手段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力度。有学者从财政资金助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视角展开讨论。如张伟等(2020)、黄君洁(2021)、冯晨等(2021)指出,政府应充实预备费、购买农业保险、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服务,并将应急资金更多地向困难群体倾斜,以保障受困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sup>[8-10]</sup>。宋旭光等(2008)认为政府在明确财政支出方向的同时还应优化资金筹措、配置、使用和管理策略,以提高财政效率<sup>[11]</sup>。卓志和段胜(2012)认为政府将应急治理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有利于使应急资金效用最大化<sup>[12]</sup>。另有学者将研究置于减税视角,如郭俊华和程琼(2009)、何立和谢婧(2014)、朱武祥等(2020)梳理出无论应急事件呈现何种时空复杂性,政府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皆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三大税种为核心,以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等小税种为补充,且不断致力于适用标准、办理流程的统一与规范<sup>[13-15]</sup>。还有研究指出,目前部分欠合理的税收优惠与税收中性、宽税基、简税制的原则相悖,削弱了税收收入筹集能力,使政府愈加依赖非税收入弥补财政资金缺口,因此应探索社保费、租金、利息、水电费、行政收费等非税负担的“补”“降”“缓”“免”政策<sup>[16]</sup>,注重政策条款的常态化和层次化<sup>[17]</sup>,从而多措并举推动应急政策的实施,增强企业的内生动能。

2010年的洪灾为识别应急事件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实验。通过梳理《水情年报》数据发现,2010年洪灾影响城市达166个,与历年洪灾相比,60个受灾不频繁的城市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灾情突发性、预测难度大的特征与2021年7·20河南暴雨相近。2010年洪灾发生后,各地地方政府出台了“补”“降”“缓”“免”相结合的应急降费政策,这些政策与2020年以来应对新冠疫情的政策相似,为近年来应急财税政策的系统性优化提供了证据支撑。明确研究对象后,本文运用2008—2012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和强度双重差分模型,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要求下要素配置和收益视角,剔除常年频发洪灾的地区,追踪应急事件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许多文献虽然运用理论、实证和案例分析法探讨了财政补助和减税政策机制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但大规模财政补助的持续性、税收优惠对企业的实际效果应辩证看待,如果企业收入少、利润为负,则增值税、所得税减免政策的实际效果会大打折扣。相比之下,非税负担的形式更加复杂多样,实际费率因企业生存和发展状况而异,因此降费政策的研究仍有拓展补充的空间。本文运用多种降费政策进行机制分析,有利于识别出企业不同状态下政府差异化降费政策出台的积极性,为企业成长提供更为充分的因果证据。(2)目前的异质性研究局限于分地区、分市场主体类型视角,未能考虑配套制度和资金环境在政府决策中发挥的作用,本文将异质性研究拓展至灾前和灾后双重维度,讨论灾前财政政策偏好、财力保障水平、灾后税收优惠在应急降费政策出台中发挥的作用,对构建系统化的应急财税治理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 二、理论分析

在正常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通过成本控制来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收益率。但突如其来的应急事件使企业生产经营发生中断,面对营业收入下降的情形,企业正常的成本控制手段可能难以对冲急剧上升的超预期成本。这一问题的背后不只是营业外支出的上升,还包括营业成本占营业收入之比的增加。营业成本中的固定成本贯穿企业资产持有和劳动力维稳的全过程,不随业务量的减少而降低,其中社保费、租金和利息负担尤为突出<sup>①</sup>。从资产持有角度来看,资金禀赋的限制增加了企业以钱货两清方式购入固定资产的

<sup>①</sup> 根据2008—2012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的成本费用指标计算,企业社保费支出与营业收入之比达7.18%,租金与营业收入之比达11.37%,利息与营业收入之比达4.55%。

难度,相比之下,经营租赁或融资租赁的方式有利于企业加快资产使用权取得速度,规避资产过时的问题,但使企业将租金和利息纳入资产租用各期的成本预算<sup>[18]</sup>。从劳动力角度来看,企业缴纳的社保费具有强制性和固定性<sup>[19]</sup>,不以企业停工、待岗等情况为转移,且缴库后由政府进行统筹管理,无法单独支取,因此社保费也成为企业成本的“痛点”。

通过上述论证发现,一旦企业降低生产强度,延长生产周期,则企业持有资产和维稳劳动力的规模报酬会趋于下降,使社保费、租金和利息三种固定成本呈现出沉没成本的属性<sup>[20]</sup>。政府如果不加干预,则会导致企业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甚至迫使企业作出变卖自有资产、降低员工薪酬的决策,不利于企业根本性摆脱生存危机。为此,政府会出台以下两类政策:一是减免租金和利息,通过降低企业生产设备停运期间的使用负担确保资产规模的稳定;二是减免社保费,通过降低员工闲暇时的缴费负担来提升员工工资,有利于劳动力队伍的稳定。以上举措有利于避免要素资源流失,降低企业停工停产固定(沉没)成本带来的生存风险。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灾后政府出台以减免租金、利息和社保费为核心的固定成本降费政策,有利于企业恢复成长。

企业解决停工停产的固定成本问题仅表明企业短暂摆脱了生存困境。随着复工复产后业务量的增加,企业负担的水电费、行政收费等可变成本不断上升。具体而言,企业生产设备恢复运行和员工返岗所耗费的水、电资源皆由经营所在地的水电供应部门提供,然而水电供应部门的自然垄断性限制了企业的选择权和议价权,因此为了应对水电费刚性负担,企业可能通过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销售价格来转嫁成本,这将影响客户的购买意愿<sup>[21]</sup>。在持续经营的过程中,企业拓展业务和异地经营通常需要政府出具行政审批许可,业务拓展和异地经营需求越大,涉及的行政审批就越频繁,如果地方政府审批事项过多、收费过高,则企业为之付出的额外负担会上升<sup>[22]</sup>。企业采取扩大生产经营的良性举措,却负担着愈加繁重的生产要素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这势必会降低要素配置效率,挤占企业利润,进而使企业未来的发展决策受到干扰。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政府会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对企业给予水电费补贴,对因不可抗力事件难以缴纳的可延缓缴纳。通过降低企业当期水、电购买成本促使生产设备及时恢复运行和员工有序复岗,既能减少要素成本上升对生产力恢复的干扰,又能降低企业成本转嫁对客户购买意愿的不利影响。二是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通过降低企业为申请行政审批付出的货币成本,有利于减轻企业的时间和心理负担。以上举措有助于降低企业要素配置能力恢复和收入创造过程中的可变成本,为企业积累留存收益谋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灾后政府出台以补贴或缓缴水电费、清理行政收费为代表的可变成本降费政策,有利于企业加速成长。

地方政府出台多种降费政策的初衷是解决企业差异化成本问题,但政策的有力实施离不开配套制度和资金保障<sup>[23-24]</sup>。成熟而优良的制度环境能为应急政策的及时实施提供基础性政策保障,避免出现非正常干预的情形<sup>[25]</sup>,进而为企业生存和发展营造稳定的环境。财政政策偏好体现着政府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表达的期望。受灾前经济增长情况差异的影响,部分地方政府会采取紧缩型财政政策缓解灾前经济过热的问題,但灾后经济下行压力考验着财政政策由紧缩向扩张转变的能力。如果灾前地区经济长期处于稳态,则政府在日常决策时可能会形成“习以为常”的惯性思维<sup>[26]</sup>,放松对或有风险的警惕。一旦应急事件发生,或有风险质变为现实风险,政府的即时决策则会产生不确定性。因此,灾前财政政策偏好是影响降费政策出台积极性的第一类因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财政政策的复杂性缘于财政资金保障能力的差异。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权上

移、事权下移的分权导向使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不断减少,预算约束趋紧。当既有的财政资金无法满足经济建设的现时乃至未来需要时,财政压力会愈加明显。巨大的财政压力会使政府努力追求财政收入的增加,除减税政策的“红利”被税收任务硬约束带来的强征管举措所“稀释”外<sup>[27]</sup>,组织非税收入也会成为政府应对财政减收的策略性行为<sup>[28]</sup>,这些动机的增强会使降费政策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因此,灾前财力保障水平是影响降费政策出台积极性的第二类因素。

除政府偏好和财政压力外,政府对灾后各项扶持政策的主观态度也会影响降费政策出台的积极性。持政策相容观点的学者指出,不同类型的政策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有利于发挥叠加优势,以实现效用最大化<sup>[29-30]</sup>;认为政策存在互斥的学者则强调,当各项财税政策目标一致时,不同类型财税政策的激励效果存在差异,个别政策的实施可能会挤出其他政策的实际效用<sup>[15,31]</sup>。应急事件发生后,多地政府会率先出台并丰富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减税力度,但降费政策的数量存在明显的差异<sup>①</sup>。由此推论,灾后税收优惠出台情况可能是影响降费政策出台积极性的第三类因素。

综合上述分析,与应急降费政策相关的配套制度和资金环境包括灾前财政政策偏好、灾前财力保障和灾后税收优惠三个方面。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地方灾前、灾后配套制度和资金环境差异会影响应急降费政策出台积极性。

### 三、实证模型、变量和数据

#### (一) 模型构建

洪灾属于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符合外生事件冲击的条件。根据2010年洪灾影响范围,有部分城市受到了冲击,符合双重差分模型明确区分实验组(灾区企业)和控制组(非灾区企业)的要求,因此适合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分析。传统双重差分模型根据企业经营所在地是否受灾进行0-1赋值,但2010年洪灾强度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因此为了识别洪灾强度的边际效应,本文在传统双重差分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强度双重差分模型,以识别洪灾影响程度,具体模型如式(1)所示:

$$Growth_{tce} = \alpha_1 + \beta_1 Flood_{tce} + \gamma_1 C_{tce} + \eta_t + \iota_e + \varepsilon_{tce} \quad (1)$$

式(1)中, $\alpha_1$ 为常数项, $Growth$ 是企业成长情况, $\beta_1$ 是洪灾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系数。 $Flood$ 是洪灾冲击,为洪灾发生时间( $Time$ )和地区受灾情况分组( $Treat$ )的交乘项(具体构建方法在变量定义中将详细说明)。 $C$ 为其他控制变量集合。下标 $t$ 为时间、 $c$ 为企业经营所在城市、 $e$ 为企业个体。 $\eta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iota_e$ 为企业固定效应。 $\varepsilon$ 为扰动项。

#### (二) 变量定义

关于企业成长情况因变量( $Growth$ ),已有文献选用企业资产总额、从业人数、营业收入等指标来衡量<sup>[32-33]</sup>,但这些指标侧重于规模增量,难以反映企业既有资本创收能力和内在成长空间。还有学者以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为切入点,指出企业成长的衡量指标除规模增量外,还包括要素配置和收益能力,反映上述两种能力的核心是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收益率,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要求下企业纾困的研究需求<sup>[34-35]</sup>。因此,本文运用全要素生产率( $Growth^A$ )和资本收益率( $Growth^B$ )衡量企业成长情况。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主要包括索洛残差法、OP法和LP法<sup>[36-37]</sup>。索洛残差法存在同时性偏差和样本选择偏差问题<sup>[38]</sup>,OP

① 以新冠疫情为例,仅2020年上半年,地方政府出台的税收优惠相关政策达295条,但租金、利息减免相关政策仅有65条、清理政府收费相关政策仅有22条。

法处理生产率冲击代理变量时投资额为0的企业样本被舍弃,导致测算的样本量大幅减少,存在“以偏概全”之嫌。LP法运用中间投入作为生产率冲击的代理变量,解决了OP法企业样本损失严重的问题。通过考量上述三种方法的优劣,本文运用LP法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更全面地反映企业的要素配置能力。资本收益率的测算方法一般为净利润除以年末净资产,该方法虽然能反映自有资本的效率,但难以体现企业全部持有资产的运用能力,且无法排除负债畸高对盈利水平的影响,因此本文将资本收益率替换成资产收益率,资产收益率的分母由净资产相应地替换为资产总额,有利于准确反映企业的收益能力,克服资本收益率指标的不足。

关于洪灾冲击核心自变量(*Flood*),本文首先明确洪灾冲击交乘项中的时间(*Time*)变量,在2010年洪灾发生当期对变量进行赋值,当 $t \geq 2010$ ,则赋值为1,反之为0。关于分组(*Treat*)变量,《水情年报》中准确记载了全国三千多个水文站监测的洪水具体地点和影响范围,涵盖江河干流和支流,可提高洪水影响区域识别的准确性,如果某个或多个水文站监测到了超警戒水位洪水,则可判断该水文站所属的地级市发生了洪灾。因此,本文从相应年份《水情年报》中提取出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的水文站信息,并通过谷歌地图查找各水文站对应的地级市,若地级市所辖水文站出现了超警戒水位洪水,则该地级市的所有企业赋值为超警戒水位洪水高度的自然对数,反之为0。超警戒水位洪水水位越高,表明洪灾强度越大。

控制变量(*C*)分为政策、企业和城市三个层面。在政策层面,2010年洪灾发生时间和应急降费政策出台时间与“四万亿”刺激计划存在重合,因此为了减轻同期重大政策的干扰,本文结合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关于城乡保障房、交通、环保、创新投资等方面的政策部署,控制了“四万亿”投资政策变量。考虑到不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企业所在地发展情况的差异,本文还控制了企业、城市变量。企业层面包含企业特征(企业规模、有形资产比率、职工待遇)、偿债能力(资产负债率)、营运能力(存货周转率)、成本费用状况(收入成本率、期间费用率)、企业利得(营业外收入)五大指标;城市层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支出两项指标。“四万亿”政策控制变量数据来自各地政府官方披露的投资政策文本信息,企业控制变量数据来自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城市控制变量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 (三) 数据的搜集和描述

关于城市样本,考虑到部分城市频遭洪灾的影响,2010年洪灾对这些城市企业而言并非应急事件,本文根据2000—2009年《水情年报》水文站信息,将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达5年及以上的115个地级市剔除<sup>①</sup>;直辖市受灾后较非直辖市更容易直接享受到中央政策倾斜,这可能使企业成长速度产生系统性差异,因此本文剔除经营所在地位于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的企业。经过上述筛选,本文得到了185个用于实证分析的地级市,其中包括2010年遭遇极端洪灾的60个地级市。

关于企业样本,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虽然收录了各地注册的非上市企业,但2010年数据缺失严重。上市企业数据虽然可得性高,但与非上市企业相比资金规模更大、业务范围更广、融资渠道更宽,且能利用母子公司异地关联交易对冲个别地区受灾对企业整体的不利影响,因此可能导致实证结果存在偏差。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克服了上述数据的缺陷,既完整收录了非上市企业,又全面记载了2010年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因此,本文运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中的非上市企业进行基准回归,并将上市企业用于稳健性检验。为了保证洪灾前后至少有2期数据可比,本文将数据时间设为2008—2012年;为了减少灾前长期亏损企业的影响,本文参照ST企业识别策略,剔除连续两年及以上利润为负的企业;为了减轻企业灾后退出现场的

<sup>①</sup> 115个地级市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

影响,本文对样本进行平衡化处理,重点追踪在位企业的成长情况。经过上述筛选、剔除缺失值后,本文得到了 34 921 家企业的 174 605 条观测值。

表 1 是各变量完成 1%和 99%缩尾处理后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样本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标准差达 1.262 4,资产收益率变异系数达 0.090 2/0.027 2=3.316 2,说明企业成长情况存在显著的差异,具有实证分析的价值。

表 1 主要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企业成长( <i>Growth</i> )	A:LP 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	171 642	7.543 6	1.262 4	3.668 0	10.724 4
	B:年末净利润/期末资产总额	174 157	0.027 2	0.090 2	-0.336 2	0.362 3
洪灾冲击( <i>Flood</i> )	洪灾影响时间与强度的交乘项	174 605	0.130 7	0.431 5	0.000 0	3.210 4
企业规模( <i>Size</i> )	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174 605	10.677 7	1.970 7	0.000 0	19.506 5
有形资产比率( <i>FAI</i> )	年末固定资产总额/期末资产总额	174 605	0.268 2	0.213 0	0.000 0	0.920 0
职工待遇( <i>ET</i> )	全年计提的工资和奖金/从业人数	174 605	27.041 3	19.957 4	0.000 0	119.629 8
资产负债率( <i>ALR</i> )	期末负债总额/期末资产总额	174 605	0.600 1	0.305 7	0.000 0	1.775 6
存货集中度( <i>LI</i> )	年末存货净额/期末资产总额	174 605	0.197 6	0.182 2	0.000 0	0.784 9
收入成本率( <i>LCR</i> )	营业成本总额/营业收入总额	174 605	0.840 7	0.156 5	0.000 0	1.251 8
期间费用率( <i>PER</i> )	期间费用总额/营业收入总额	174 605	0.203 0	0.538 5	0.000 0	4.832 9
企业利得( <i>EG</i> )	营业外收入总额/营业收入总额	174 605	0.009 5	0.028 3	0.000 0	0.224 1
经济发展水平( <i>GDP</i> )	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	174 605	16.345 8	2.213 0	5.453 8	18.679 2
财政支出( <i>FE</i> )	财政支出总额/地区生产总值	174 605	0.139 3	0.065 4	0.060 9	0.456 0
“四万亿”政策( <i>SP</i> )	城乡保障房、交通、环保和创新投资政策个数	174 605	5.829 3	6.036 5	0.000 0	25.000 0

## 四、实证基本结果

### (一) 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有效的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即 2010 年洪灾发生前灾区与非灾区企业的成长情况差异不显著。为了检验平行趋势,本文基于事件分析法构建了如式(2)所示的模型:

$$Growth_{ice} = \alpha_2 + \kappa_1 pre_{-2} + \kappa_2 pre_{-1} + \kappa_3 post_1 + \kappa_4 post_2 + \gamma_2 C_{ice} + \eta_t + \nu_e + \varepsilon_{ice} \quad (2)$$

其中,*pre*和*post*分别为洪灾发生前后时间(*Time*)与分组(*Treat*)的交乘项,其余符号含义与式(1)相同。为了保证企业成长情况的可比性,本文删除了 2010 年的企业样本。不同时间的系数  $\kappa$  是判断平行趋势的核心依据,当  $\kappa_1$ 、 $\kappa_2$  不显著异于 0,则灾区和非灾区企业成长情况在洪灾发生前差异不显著。图 1 的结果显示,系数  $\kappa_1$ 、 $\kappa_2$  不显著, $\kappa_3$ 、 $\kappa_4$  显著高于 0,反映出灾区和非灾区企业成长情况产生了显著的差异,模型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 (二)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是 2010 年洪灾对企业成长情况的实证估计结果。列(1)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因变量,仅考虑洪灾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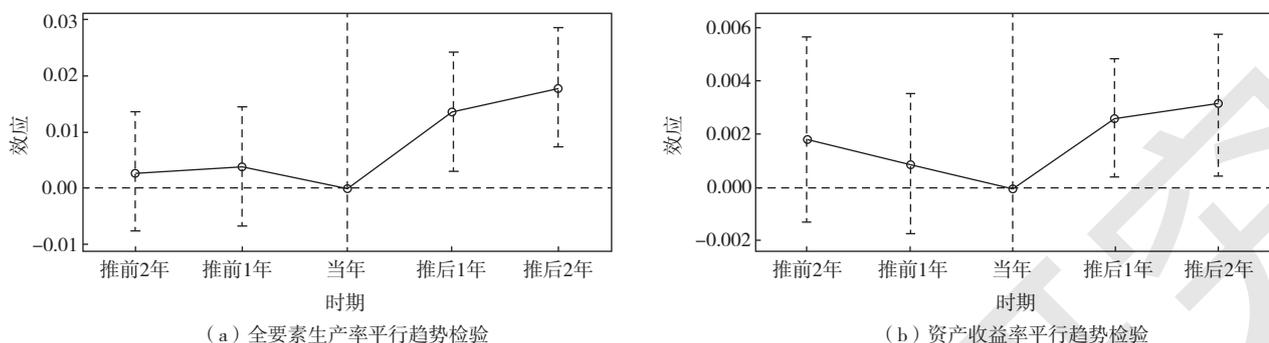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核心自变量,结果发现  $Flood$  对  $Growth^A$  的  $\beta_1$  系数为 0.014 1,且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其经济含义为灾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高于非灾区企业,且洪灾强度每高出 1 个单位,对应的灾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高出  $0.014 1 / 7.543 6 = 0.19\%$ 。列(2)—列(4)依次加入了企业、城市和“四万亿”政策控制变量, $\beta_1$  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速度与洪灾强度呈正相关。列(5)—列(8)将因变量替换为资产收益率进行逐步回归,发现  $Flood$  对  $Growth^B$  的  $\beta_1$  系数为 0.001 9,其经济含义为洪灾强度每高出 1 个单位,灾区企业的资产收益率高于非灾区企业  $0.001 9 / 0.027 2 = 6.99\%$ 。以上结果表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资产收益率未因洪灾的影响而下降,而是整体稳中有升。

依常理,洪灾对企业要素配置和收益的影响为负<sup>[39-40]</sup>,而本文基准回归得到的  $\beta_1$  系数为正,这一反常现象既可能缘于企业强大的抗风险能力<sup>[41]</sup>,也可能缘于政府强有力的财税支持<sup>[30,42]</sup>。若使研究结论真实可信,则需通过稳健性检验和机制分析提供更多证据。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 $Growth^A$ )				资产收益率( $Growth^B$ )			
	(1)	(2)	(3)	(4)	(5)	(6)	(7)	(8)
$Flood$	0.014 1*** (0.003 8)	0.018 1*** (0.003 6)	0.011 7*** (0.003 7)	0.012 4*** (0.003 8)	0.002 5*** (0.000 5)	0.002 4*** (0.000 5)	0.002 1*** (0.000 5)	0.001 9*** (0.000 5)
常数项	7.541 7*** (0.001 3)	5.258 2*** (0.025 8)	1.972 9*** (0.364 8)	2.159 0*** (0.372 8)	0.026 9*** (0.000 2)	0.221 9*** (0.004 7)	0.064 0 (0.049 8)	0.085 1* (0.050 9)
企业控制变量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控制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四万亿”政策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N$	171 634	171 634	171 634	171 634	174 156	174 156	174 156	174 156
$R^2$	0.877 9	0.894 3	0.894 3	0.894 5	0.530 1	0.601 5	0.601 5	0.601 5

注:列(1)仅考虑洪水冲击,列(2)—列(4)依次加入企业、城市和“四万亿”政策控制变量。列(5)—列(8)将因变量替换为资产收益率进行逐步回归。\*、\*\*、\*\*\*表示系数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城市聚类稳健标准误,后表同。

### (三) 稳健性检验

#### 1. 安慰剂检验

虽然双重差分模型满足平行趋势,但实验组与控制组企业之间仍可能存在不可观测且随时间变化的因

素,容易导致回归结果的系统性偏误,因此需要进行安慰剂检验。本文假设2010年洪灾在2009年( $pre_{-1}$ )或2008年( $pre_{-2}$ )就已经发生,如果 $pre_{-1}$ 或 $pre_{-2}$ 的 $\beta_1$ 系数显著为正,则表明企业成长情况显著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而非2010年洪灾所致。表3列(1)和列(2)结果显示, $\beta_1$ 系数不再显著,说明从统计意义来看,企业成长情况未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 2. 排除旱灾等因素影响

通过梳理《中国气象年鉴》中的自然灾害资料发现,2010年汛期前后,广西、四川、贵州、云南四省份发生了连片旱情,当地政府积极出台财税扶持政策,旨在降低缺水、缺电对企业的损失。因此,本文剔除了这四省份的企业样本。进一步,为了控制地级市和行业其他政策对企业成长可能的非线性影响,本文考虑了“时间×城市/时间平方”和“时间×行业/时间平方”趋势效应。表3列(3)和(4)列结果显示, $\beta_1$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洪灾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仍然显著。

### 3. 替换因变量

虽然本文在变量定义中论证了全要素生产率和资产收益率指标在衡量成长质量方面的优势,但指标值的变化可能因企业灾前、灾后的成长周期、内部决策等因素而异,部分企业灾后可能采取减持资产甚至裁员的策略,进而出现产出规模维持但全要素生产率或资产收益率快速上升的情形<sup>[43]</sup>。为了克服这一内生性干扰,本文将因变量替换为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和从业人数的自然对数进行实证检验。表3列(5)和列(6)结果显示, $\beta_1$ 系数仍在至少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灾后企业的成长未以资产减持和裁员为代价。

### 4. 替换自变量

本文将洪灾分组变量由连续型变量替换为0-1离散型变量,具体将洪水超过警戒水位的地级市一律赋值为1,未超警戒水位的地级市赋值为0,运用传统双重差分模型验证强度双重差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表3列(7)和列(8)结果显示, $\beta_1$ 系数依然显著为正。

### 5. 使用上市企业数据

本文将企业样本由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替换为上市企业数据,探究基准回归结果是否受到数据库样本选择的干扰,结果显示Flood对 $Growth^A$ 、 $Growth^B$ 的 $\beta$ 系数分别为0.0011<sup>\*\*\*</sup>和0.0003<sup>\*\*</sup>。

以上稳健性检验充分证明,灾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资产收益率稳中有升的现象确实存在。

表3 稳健性检验

变量	安慰剂检验		排除旱灾等因素影响		替换因变量		替换自变量	
	(1)	(2)	(3)	(4)	(5)	(6)	(7)	(8)
$pre_{-2}$	0.0061 (0.0152)	-0.0040 (0.0025)						
$pre_{-1}$	0.0179 (0.0121)	0.0015 (0.0025)						
Flood			0.0084 <sup>**</sup> (0.0038)	0.0019 <sup>***</sup> (0.0005)	1.4665 <sup>**</sup> (0.7420)	0.4598 <sup>***</sup> (0.1409)	0.0159 <sup>***</sup> (0.0055)	0.0018 <sup>**</sup> (0.0008)
常数项	2.4248 (1.7419)	0.0648 (0.1607)	30.5827 <sup>***</sup> (4.4794)	3.4724 <sup>***</sup> (0.6087)	71.3815 (72.9125)	-47.1965 <sup>***</sup> (13.8501)	2.0189 <sup>***</sup> (0.3681)	0.0605 (0.05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表3(续)

变量	安慰剂检验		排除旱灾等因素影响		替换因变量		替换自变量	
	(1)	(2)	(3)	(4)	(5)	(6)	(7)	(8)
趋势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i>N</i>	136 813	139 327	158 442	160 717	174 605	174 605	171 634	174 156
<i>R</i> <sup>2</sup>	0.895 1	0.614 9	0.893 4	0.601	0.854 5	0.694 7	0.894 5	0.601 5

注:企业、城市和“四万亿”政策控制变量合并为控制变量,时间和企业固定效应合并为固定效应。安慰剂检验前,本文将影响起始年份(2010年)的企业样本予以剔除。

## 五、含调节效应的机制分析

### (一) 机制分析模型构建

上文分析了洪灾对企业成长的直接影响。为了探究灾后企业保持成长的原因,识别政府行为对企业成长的边际效应,本文设  $M$  为机制变量,在式(1)的基础上构建如式(3)所示的模型:

$$M_{ice} = \alpha_3 + \mu_1 Flood_{ic} + \gamma_3 C_{ice} + \eta_t + \nu_e + \varepsilon_{ice} \quad (3)$$

式(3)中,  $\mu_1$  为  $Flood$  对  $M$  的影响系数。具体讨论的机制如下:(1)运用减免和缓缴社保费、减免租金和利息政策,探究地方政府出台固定成本降费政策( $M_1$ )的积极性;(2)选取补贴或缓缴水电费、清理行政收费项目政策,分析可变成本降费政策( $M_2$ )出台的积极性。

进一步,为了捕捉影响应急降费政策出台积极性的配套制度和资金环境因素,本文引入调节效应模型,设  $H$  为调节变量,引入交乘项( $Flood \times H$ ),构建如式(4)所示的模型:

$$M_{ice} = \alpha_4 + \mu_2 Flood_{ic} \times H_{ic} + \beta_1 Flood_{ic} + \beta_2 H_{ic} + \gamma_4 C_{ice} + \eta_t + \nu_e + \varepsilon_{ice} \quad (4)$$

式(4)中,  $\mu_2$  为  $Flood \times H$  对  $M$  的影响系数,  $\beta_2$  为  $H$  对  $M$  的影响系数。具体指标如下:(1)灾前财政政策偏好( $H_1$ );(2)灾前财力保障水平( $H_2$ );(3)灾后税收优惠( $H_3$ )。指标的具体度量方法将在下文中详细说明。

最后,为了评估应急降费政策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效果,本文构建如式(5)所示的模型:

$$Growth_{ice} = \alpha_5 + \mu_3 M_{ic} + \gamma_5 C_{ice} + \eta_t + \nu_e + \varepsilon_{ice} \quad (5)$$

式(5)中,  $\mu_3$  为  $M$  对  $Growth$  的影响系数。

### (二) 降低固定成本:减免和缓缴社保费、减免租金和利息

#### 1. 政策出台积极性评估

关于固定成本降费政策,为了确保政策数据与洪灾事件的强关联性,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法,从各级政府网站中手工搜集了官方政策文件。具体步骤如下:(1)将“洪灾+社保费/租金(费)/使用费/利息”设为必须出现的字段,提取出社保费减免和缓缴、减免租金和利息相关政策文件,具体关键词包括“减/免/缓征(收)”“延期缴纳”“减免滞纳金”;(2)从政策中提取地名信息,当  $t$  年的标题或全文中出现了“某省份灾后出台了社保费、租金或利息政策”之类的主题句时,则该省份或地级市的所有企业从  $t$  年起计入政策出台的个数,反之为0。表4列(1)运用洪灾对固定成本降费政策进行回归,结果显示  $Flood$  对  $M_1$  的系数  $\mu_1$  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洪灾发生后,灾区政府切实出台了以减免和缓缴社保费、减免租金和利息为核心的固定成本降费政策,且洪灾强度越强,政府出台的固定成本降费政策越多。

#### 2. 考虑灾前财政政策偏好

税收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灾前减税积极与否则反映出政府是否倾向于积极的财政政策,

因此本文运用减税积极性反映地方政府财政政策偏好。关于指标的衡量方法,马海涛等(2022)认为当某地税收收入增幅连续呈下降趋势,则可判断当地政府积极实施了减税政策<sup>[43]</sup>。因此,本文运用前三年人均税收收入增幅的移动平均变化率来衡量企业经营所在地灾前减税积极性。若变化率为负,则对应地级市的企业赋值为1(减税积极性高);若变化率为正,则为0(减税积极性低)。表4列(2)结果显示, $Flood \times H_1$ 对 $M_1$ 的系数 $\mu_2$ 显著为正,其经济含义为在灾前减税积极性高的地区,政府灾后出台社保费减免和缓缴、租金和利息减免政策的主动性更高,反映出灾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灾后固定成本降费政策出台积极性具有正面效应。

### 3. 考虑灾前财力保障水平

在预算内的口径下,财政自给率能反映预算收支压力。自给率越高,表明预算收支压力越小。现有的研究基于当年一般预算收支差额构建财政自给率指标<sup>[44]</sup>,未考虑时间变化趋势的影响,因此测算的结果难以排除特定年份偶然性经济社会因素的干扰。本文计算企业经营所在地前三年一般预算收支差额的移动平均变化率,该方法充分考虑了时间趋势,有利于减轻偶然因素的影响。如果变化率为正,则对应的地级市企业赋值为1(自给率持续提升);若变化率为负,则为0(自给率持续下降)。表4列(3)结果显示, $Flood \times H_2$ 对 $M_1$ 的系数 $\mu_2$ 为正,其经济含义为在灾前财政自给率持续提升的地区,政府更积极地出台了社保费减免和缓缴、租金和利息减免政策,反映出充足的财力保障是固定成本降费政策出台积极性提升的必要条件。

### 4. 考虑灾后税收优惠政策

为了判断地方政府灾后是否同时出台了税收优惠政策,本文从各级政府网站搜集灾后减免增值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企业所得税相关的政策文件,如果某省份或地级市政府在 $t$ 年实施了税收优惠政策,则对应的地级市企业从 $t$ 年起赋值为1,反之为0。表4列(4)结果显示, $Flood \times H_3$ 对 $M_1$ 的系数 $\mu_2$ 为正,其经济含义为如果地方政府灾后出台了税收优惠政策,则同样也会积极出台降费政策,反映出税收优惠和降费两类惠企政策不存在“互斥”的情形。

### 5. 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表4列(5)和列(6)分别运用全要素生产率和资产收益率对固定成本降费政策进行回归,结果发现 $M_1$ 对 $Growth^A$ 、 $Growth^B$ 的系数 $\mu_3$ 都显著为正,表明如果企业经营所在地政府出台了固定成本降费政策,则全要素生产率和资产收益率高于未出台固定成本降费政策的地区企业。系数 $\mu_3$ 大小分别为0.0138和0.0014,其经济含义为政府每新出台一项固定成本降费政策,当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资产收益率会在原有基础上分别提升 $0.0138/7.5436=0.18\%$ 和 $0.0014/0.0272=5.15\%$ ,表明政府运用固定成本降费政策激励企业成长是行之有效的。假设1得到了验证。

表4 机制分析(1):降低企业固定成本

变量	政策出台积极性				政策实施效果	
	(1)	(2)	(3)	(4)	(5)	(6)
$Flood$	0.1520*** (0.0029)	0.1497*** (0.0029)	0.1517*** (0.0029)	0.0997*** (0.0028)		
$Flood \times H_1$		0.0114*** (0.0021)				
$Flood \times H_2$			0.0035*** (0.0009)			
$Flood \times H_3$				0.0433*** (0.0022)		

表4(续)

变量	政策出台积极性				政策实施效果	
	(1)	(2)	(3)	(4)	(5)	(6)
$M_1$					0.013 8*** (0.005 1)	0.001 4*** (0.000 5)
常数项	3.672 1*** (0.192 3)	3.705 7*** (0.192 3)	3.446 1*** (0.195 0)	6.253 9*** (0.177 9)	-1.990 0*** (0.367 7)	-0.050 6 (0.035 2)
子项 $H$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74 605	174 605	174 605	174 605	171 634	174 156
$R^2$	0.488 1	0.488 2	0.488 3	0.575 4	0.894 5	0.632 6

注:列(1)为洪灾对企业固定成本降费政策的回归结果。列(2)—列(4)依次考虑了灾前财政政策偏好、灾前财力保障水平、灾后税收优惠政策。列(5)因变量为全要素生产率( $Growth^A$ ),列(6)因变量为资产收益率( $Growth^B$ )。后表同。

### (三)降低可变成本:补贴或缓缴水电费、清理行政收费项目

关于可变成本降费政策,本文的手工收集数据步骤如下:(1)在各级政府网站中键入字段“洪灾+水费/电费/行政事业性收费(含手续费/工本费/服务费)”,提取出地名信息;(2)如果省级或市级政府网站在  $t$  年出现了“超额部分给予补贴”“缓缴/延期/宽限”“清理/下调费用”之类的关键词,则该省份或城市的所有企业从  $t$  年起计入政策出台的个数,反之为0。完成收集后,本文对政策出台积极性和实施效果进行评估。表5列(1)的结果显示, $Flood$  对  $M_2$  的系数  $\mu_1$  显著为正,其经济含义为地方政府根据辖区遭受洪灾的强度切实出台并丰富了以补贴或缓缴水电费、清理行政收费项目为代表的可变成本降费政策;列(5)和列(6)的结果显示, $M_2$  对  $Growth^A$ 、 $Growth^B$  的系数  $\mu_3$  分别为0.017 4和0.002 0,其经济含义为地方政府每出台一项可变成本降费政策,灾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提升  $0.017 4/7.543 6=0.23%$ ,资产收益率可增加  $0.002 0/0.027 2=7.35%$ 。假设2得到了验证。

进一步,本文讨论配套制度和资金环境差异在政府决策中发挥的作用。灾前减税积极性和财政自给率差异的实证结果,如表5列(2)和列(3)所示, $Flood \times H_1$ 、 $Flood \times H_2$  对  $M_2$  的系数  $\mu_2$  显著为正,反映出灾前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充足的财力保障是可变成本降费政策有力出台的重要支撑;灾后税收优惠差异的实证结果如表5列(4)所示, $Flood \times H_3$  对  $M_2$  的系数  $\mu_2$  也为正,表明地方政府灾后部署税收优惠政策的同时积极出台了可变成本降费政策,不存在“边减税边增费”的情形。假设3得到了验证。结合前文固定成本降费政策的结果可总结出,优良的配套制度和资金环境是政府提高降费政策积极性的必要条件。假设3得到了验证。

表5 机制分析(2):降低企业可变成本

变量	政策出台积极性				政策实施效果	
	(1)	(2)	(3)	(4)	(5)	(6)
$Flood$	0.056 6*** (0.001 9)	0.056 8*** (0.001 9)	0.055 7*** (0.001 9)	0.025 7*** (0.001 5)		
$Flood \times H_1$		0.003 8*** (0.001 4)				
$Flood \times H_2$			0.005 8*** (0.000 6)			

表5(续)

变量	政策出台积极性				政策实施效果	
	(1)	(2)	(3)	(4)	(5)	(6)
$Flood \times H_3$				0.016 0*** (0.002 5)		
$M_2$					0.017 4** (0.008 1)	0.002 0*** (0.000 8)
常数项	2.800 7*** (0.125 2)	2.797 6*** (0.125 2)	2.803 0*** (0.126 9)	4.727 4*** (0.099 9)	1.393 5*** (0.382 9)	-0.047 0 (0.035 1)
子项 $H$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174 605	174 605	174 605	174 605	171 634	174 156
$R^2$	0.482 9	0.483 1	0.483 3	0.671 9	0.826 2	0.632 6

##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运用2008—2012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和强度双重差分模型对2010年洪灾应急突发事件后企业成长情况的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洪灾发生后,灾区政府将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降费政策多措并举,助推了灾区企业成长,验证了政府兜底保障的重要性;积极的财政政策、充足的财力保障为应急降费政策的出台提供了制度和资金支持,降费与减税政策有机协调能发挥政策“组合拳”的叠加效应。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启示:

第一,坚持以“降成本”为导向,解决企业非税负担过重的问题。灾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资产收益率的提升未依靠资产减持和裁员来实现,而是受益于政府出台的减免和缓缴社保费、减免租金和利息、补贴或缓缴水电费、清理行政收费政策。因此,政府应以“稳增长”“稳就业”为导向,坚持全面实施“补”“降”“缓”“免”政策,既关注企业生存困境,也关注企业发展问题,重点聚焦于企业要素资源获取、配置和持有成本,以及收益积累过程中的各类负担,以帮助企业实现外延式扩张和内涵式发展的双重兼顾;同时,政府应提高降费政策的普惠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使更多企业享受到惠企措施带来的红利。

第二,以“补短板”为支撑,为应急降费政策提供配套制度和资金保障。在灾前减税积极性高、财政自给率持续提升的地区,政府灾后出台降费政策的积极性更强。因此,在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政府应对积极的财政政策进行加力提效,使政策更加稳健、有为,从而加快以降低市场主体负担为导向的财税治理能力塑造。对于灾前减税积极性低、财力薄弱的地区,政府既应改变惯性思维,树立危机意识,对或有风险进行沙盘推演,也应积极探索财政收入来源和支出策略的创新,在不增加企业负担的前提下缓解预算收支压力,提高财力保障的可持续性,逐步实现应急财税治理能力现代化。

### 参考文献:

- [1]何爱平,赵仁杰,张志敏.灾害的社会经济影响及其应对机制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4(11):130-141.
- [2]刘仁辉,安实.面对突发事件企业应急管理策略[J].管理世界,2008(5):180-181.
- [3]王遥,王文蔚.环境灾害冲击对银行违约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理论与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21(12):38-56.
- [4]刘厉兵,汪洋.自然灾害、多源比较优势与产业层次贸易流动——基于新李嘉图理论视角[J].管理世界,2011(12):172-173.
- [5]欧阳桃花,郑舒文,程杨.构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体系:基于中国情景的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20,36(8):19-32.

- [6] 张海波, 童星. 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3): 58-84, 206.
- [7] 刘尚希, 陈少强. 构建公共财政应急反应机制[J]. 财政研究, 2003(8): 15-20.
- [8] 张伟, 黄颖, 谭莹, 等. 灾害冲击下贫困地区农村金融精准扶贫的政策选择——农业信贷还是农业保险[J]. 保险研究, 2020(1): 21-35.
- [9] 黄君洁. 应急财政能否减少自然灾害损失? ——基于预备费视角[J]. 学习与实践, 2021(9): 52-62.
- [10] 冯晨, 史贝贝, 白彩全, 等. 灾害冲击与国家能力塑造——来自历史四川的证据(公元前26—公元1905年)[J]. 经济学(季刊), 2021, 21(3): 1083-1102.
- [11] 宋旭光, 庞明川, 曹志来, 等. 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资金筹措与运行机制——源于汶川地震的思考[J]. 财经问题研究, 2008(7): 8-14.
- [12] 卓志, 段胜. 防减灾投资支出、灾害控制与经济增长——经济学解析与中国实证[J]. 管理世界, 2012(4): 1-8, 32.
- [13] 郭俊华, 程琼. 我国重大自然灾害的公共财政应急措施研究——以5·12汶川大地震为例[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17(3): 45-52.
- [14] 何立, 谢婧. 地方政府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财政预警机制研究[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8(3): 64-68.
- [15] 朱武祥, 张平, 李鹏飞, 等. 疫情冲击下中小微企业困境与政策效率提升——基于两次全国问卷调查的分析[J]. 管理世界, 2020, 36(4): 13-26.
- [16] 吕冰洋, 李钊. 疫情冲击下财政可持续性研究[J]. 财贸经济, 2020, 41(6): 5-18.
- [17] 杨默如. 应对自然灾害的税收政策国际经验借鉴及启示[J]. 财政研究, 2011(12): 74-77.
- [18] 王磊, 夏纪军. 固定成本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分布[J]. 当代经济科学, 2015, 37(2): 62-69, 126.
- [19] 许红梅, 李春涛. 社保费征管与企业避税——来自《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证据[J]. 经济研究, 2020, 55(6): 122-137.
- [20] TIROLE J.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8.
- [21] 林伯强. 中国电力发展: 提高电价和限电的经济影响[J]. 经济研究, 2006(5): 115-126.
- [22] 王永进, 冯笑.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创新[J]. 中国工业经济, 2018(2): 24-42.
- [23] 陈志勇, 陈思霞. 制度环境、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与财政预算软约束[J]. 经济研究, 2014, 49(3): 76-87.
- [24] 冯俏彬, 韩博.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财政经济的影响及其应对之策[J]. 财政研究, 2020(4): 15-21.
- [25] FAN J P H, WONG T J, ZHANG T Y.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the case of state-owned corporate pyramids[J]. Th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2013, 29(6): 1217-1252.
- [25] 高培勇. “基础和支柱说”: 演化脉络与前行态势——兼论现代财税体制的理论源流[J]. 财贸经济, 2021, 42(4): 5-19.
- [26] 白云霞, 唐伟正, 刘刚. 税收计划与企业税负[J]. 经济研究, 2019, 54(5): 98-112.
- [27] 赵仁杰, 范子英. “租费替代”: 地方财政压力与企业非税负担[J]. 财政研究, 2021(6): 70-84.
- [28] 陈远燕. 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非上市公司20万户企业的实证分析[J]. 税务研究, 2016(10): 34-39.
- [29] 张翼飞, 王希瑞. 灾害冲击与小微企业税负——兼论地方政府行为的作用[J]. 财政研究, 2021(12): 93-107.
- [30] 贺炎林, 张杨, 尹志超. 如何提高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促进技术创新的有效性——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J]. 技术经济, 2022, 41(9): 10-23.
- [31] 李洪亚. 生产率、规模对企业成长与规模分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基于1998—2007年中国非制造业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 南开经济研究, 2016(2): 92-115.
- [32] 倪克金, 刘修岩.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成长: 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J]. 经济管理, 2021, 43(12): 79-97.
- [33] 杨汝岱, 朱诗娥. 市场潜力、地方保护与企业成长[J]. 经济学动态, 2015(11): 31-42.
- [34] 王爱群, 唐文萍. 环境不确定性对财务柔性与企业成长性关系的影响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7(3): 186-192.
- [35] OLLEY G S, PAKES A. The dynam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dustry[J]. Econometrica, 1996, 64(6): 1263-1297.
- [36] LEVINSOHN J, PETRIN A. 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input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3, 70(2): 317-341.
- [37] 鲁晓东, 连玉君. 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 1999—2007[J]. 经济学(季刊), 2012, 11(2): 541-558.
- [38] 林煜恩, 于家齐, 池祥萱. 地域自然灾害冲击下企业现金管理研究——基于保险的观点[J]. 保险研究, 2018(4): 65-85.
- [39] 高佳, 荣鹰. 自然灾害对企业价值的实质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地震公告的事件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 2022, 25(4): 67-87.
- [40] 何瑛, 杨琳, 文雯. 从“政治属性”到“市场理性”: 非国有股东治理机制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J/OL]. 南开管理评论, 2022[2022-10-18].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12.1288.f.20221116.1404.004.html>.
- [41] 李书娟, 陈邱惠, 徐现祥. 不利冲击下经济增长恢复的经验——基于中国经济目标管理实践[J]. 经济研究, 2021, 56(7): 59-77.
- [42] MORIKAWA M. Labor unions and productiv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Japanese firm-level data[J]. Labour Economics, 2010, 17(6): 1030-1037.
- [43] 马海涛, 文雨辰, 田影. 以减税助推共享发展: 机制分析与实际效果检验[J]. 税务研究, 2022(2): 5-13.
- [44] LIAO X X, LIU Y G. Local fiscal distress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of local SOEs[J].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4, 7(2): 119-147.

## Why Are Chinese Enterprises Reborn from Nirvana After Disaster?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Local Government Emergency Fee Cuts Policy

ZHANG Yifei<sup>1</sup>, WANG Xirui<sup>2</sup>

(1.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2. Shanghai Customs College, Shanghai 201204)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frequency of natural disasters, public health and other major emergencies, Chinese enterprises are facing uncertainty about thei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introducing a series of policies to cut and exempt social insurance premiums, reduce and waive rentals, subsidize or postpone water and electricity charges, and clean up administrative fees.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se emergency policies are still unclear.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takes the enterprises in the areas not frequently affected by the disaster before 2010 as the research object, using the 2010 flood disaster as the event impact. It then uses the national tax survey data from 2008 to 2012 and the intensity DID model to track the change in enterprise growth after the disaster.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return on assets increased steadily in flood-affected enterprises, and there were no asset reductions and layoffs. This was mainly du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fixed fee cuts policies in the affected areas with the core of reducing and postponing social insurance premiums, reducing rent and interest, and variable cost reduction policies represented by subsidizing or postponing water and electricity fees and cleaning up administrative fees. Second, governments were more motivated to introduce fee cuts policies in areas where tax cuts were active before the disaster, where fiscal self-sufficiency rates continued to rise, and where tax incentives were implemented after the disaster. The findings confirm the importance of government support, and suggest that excellent systems and adequate funding amplify the enthusiasm for fee cuts policies, and the organic coordination of tax and fee cuts policies can play a combination effect.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1) Using multiple fee cuts policies for mechanism analysis. Compared with tax cuts policies, this paper takes into account the diversity of non-tax policies and tax rate differences. It is conducive to identifying the enthusiasm for the government's differentiated fee cuts policies under different states of enterprises, providing sufficient evidence for enterprise growth. (2) Using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pre-disaster fiscal policy preferences, financial security, and post-disaster tax incentives.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role of support systems and 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 in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under the dual dimensions of pre-disaster and post-disaster, which has positive implications for building a systematic emergency fiscal and tax governance system.

**Keywords:** emergency event; enterprise cost;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fee cuts; enterprise growth

责任编辑:魏小奋